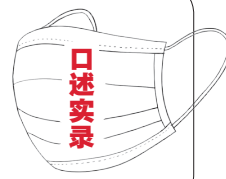


毛平，从事知识产权相关业务

有急救护理经验，还做过心理咨询，所以去武汉做了名志愿者。



理咨询和辅导。

一开始主要接听的都是朋友的朋友，慢慢地，来电话的人变得不熟悉了，电话也越来越多，最高峰的时候，一天能有上百个电话，每天早晨6点起床到晚上睡觉，我的两部手机一直不停，忙得连饭都来不及吃，而接收的大部分都是负面情绪，那段时间，我的耳朵常常因为接听电话时间过长变得难受——其实电话咨询在哪儿都能做，但我人在武汉，对于武汉的朋友来说，可能会对我更加信任。

毛平采购的部分物资。



跨省界线到湖北。



找我的人里，有因为害怕这个未知病毒的，有对于不熟悉的处境感到担忧的，大多数人则是来求助的，我常常一个电话打半个小时，通过医生朋友，我了解到发热者想做核酸检测应该要走怎样的流程、去哪些医院能检测等，我也把这些信息告诉我帮忙的朋友，甚至尽己所能帮他们联系到医院。

做电话心理咨询大概一周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。跟我求助的人里，主要是大学教授、高级白领、私企老板等等，换句话说，我的服务对象里大部分都是社会中产阶级以上，他们手里的资源相对较多，但更需要帮助的中低收入者却很少联系我。

我想到，这群失声的人，他们可能连手机都不会用，没办法给我打电话，不会抢购口罩，甚至连温饱都解决不了，他们才是我来武汉的目的。

我在武汉有几个朋友，他们在社区值班，我就通过他们深入社区，还有很多朋友通过微信给我转账，我拿着这些钱在当地购买医护物资，包括口罩、酒精、84消毒液等防护用品，体温计、药品、营养品等，再送到非常紧缺物资的患者、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医护人员那里。

当时，我每天跑几个药店，自己采购、分拣、配送分发等，口罩还是限购的，但药店知道我是买来捐赠的，就会让我多买些，到货也会给我预留。近的地方，我就步行去送，远的地方会托快递小哥，后来志愿者给了我一辆电动车，我就骑电动车送。

戴着蓝防护帽、白口罩，穿着蓝外套、黑裤子，再在脚踝处套个塑料袋，这就是我的防护措施了。这期间，我还给需要的人做心理疏导，很忙很累，但很充实。

方舱医院里的“祥林嫂”

2月19日，我随新疆兵团医疗队进驻武汉客厅方舱医院，跟随心理医生张桂青，为确诊患者做心理疏导。

在方舱医院，我第一次穿上正式的防护服，是一种窒息感